

巴金“送”文为友情

■王建军

巴金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,对待朋友“充满了真诚”。他曾说:“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,离开它生命就没了光彩,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。”巴金有很多朋友,也有说不完的友情故事。本文介绍的是巴金为友情“送”文的故事。

“送”文毛一波,《樱花时节》成友情纪念物

巴金故居的《点滴》杂志,2017年第四期刊有周立民《难以忘怀的印象——巴金的台湾之行和他的朋友们(上)》,说巴金友人毛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巴金“借”给他一篇文章的事。

毛一波是在《前尘琐忆》(未刊稿)的《记李芾甘》中说到这件事的:“他(巴金)编译过一篇小文: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》,似用PK的笔名发表在《开明》上,以后却又收入我的《樱花时节》一书(上海新时代书局出版)里,这是他送给我的。”这里,依毛一波的说法是“送”。

《樱花时节》是诗歌、小说和随笔合集。毛一波在“后记”中仅说“只有《旧痕》一首,出之于我底爱弟农海的手笔”,并未说到巴金“送”文。事实上,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》确是巴金编译,只是未“用PK的笔名发表在《开明》上”,而是署名“巴金”与毛一波的短篇《失业》、随笔《日本之秋》同时发表于1931年3月星洲日报社出版的《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》。

毛一波比巴金大三岁,是四川同乡。他俩年轻时就志趣相投。1925年9月,他与巴金、索非等1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民众社,又与巴金等同住贝勒路天祥里编辑《民众》半月刊。1927年1月,巴金去法国留学,毛一波“和(卢)剑波等亲送上船”。1929年,毛一波留学日本,与巴金的书信往来不断。巴金的成名作《灭亡》在4月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连载结束,毛一波很快于7月11日撰文给予高度评价。这也是文学评论界对《灭亡》最早的公开评价。

1931年3月,毛一波留学回到上海后,与巴金的交往甚为密切。那时他住在贝勒路马来亚书店,巴金“常来坐谈,或外出喝茶”。5月9日,他与巴金、索非夫妇同游苏州。就在这期间,毛一波编选好《樱花时节》书稿,4月6日写好“后记”,即把书稿交付新时代书局,7月正式出版。

不久,毛一波结婚,巴金曾约人去他家“饮酒祝贺”。他也到宝光里14号巴金和索非住处,一起“吃鸭子馄饨”。巴金把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》“送”给他编入《樱花时节》,显然是出于他俩的友情,《樱花时节》就是他俩的友情纪念物。

并非“孤例”,从寻找“周姚”说起

笔者发现,巴金为友情而“送”文绝非孤例。比如,由万叶书店出版的《幸福的梦》。

抗战胜利后,钱君匋的万叶



巴金编译的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》原刊于《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》,后被收入毛一波《樱花时节》。



书店迎来发展契机。他与老友索非策划了一套“万叶新辑丛书”,其中万叶译文新辑预告出版五种,所见有两种,一是高尔恰克等著、周姚译《幸福的梦》;另一是高尔基著、适夷译《老板》,均于1946年2月出版,署“主编者索非、发行者钱君匋”。

《老板》译者“适夷”,即作家楼适夷。《幸福的梦》译者“周姚”,现代文学或现代翻译文学的词典均无著录。那么,“周姚”是谁?笔者为此进行了一番“寻找”。

《幸福的梦》书前刊有“编者献辞”,由主编索非亲撰;另有“前记”,全录于下:

这些小东西是我在学习世界语时的试译,有些是世界语的原作,有些却是世界语的译作,我根据译本转译的。

我集起这个集子来,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学习成绩,却是想告诉大家:世界语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美文,藉以引起大家学习世界语的兴趣。——另一方面呢,也算替自己留下一个学习纪念。

这篇“前记”自然是译者“周姚”所写。看来,“周姚”是世界语译者。寻找“周姚”的范围,一下子缩小了许多。

《幸福的梦》共收13篇世界语译作:《家》《遗产》《四个音乐家》《小弟妹》《小红帽》《红帽女郎与狼》《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》《逃亡》《不贞之花》《幸福的梦》《小国王》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《论嫉妒》。这些译作大多发表过,但译者署名不一,有泰伦、鞠馨、无名、一切、微明等。要找到“周姚”,就必须查核清楚这些笔名的使用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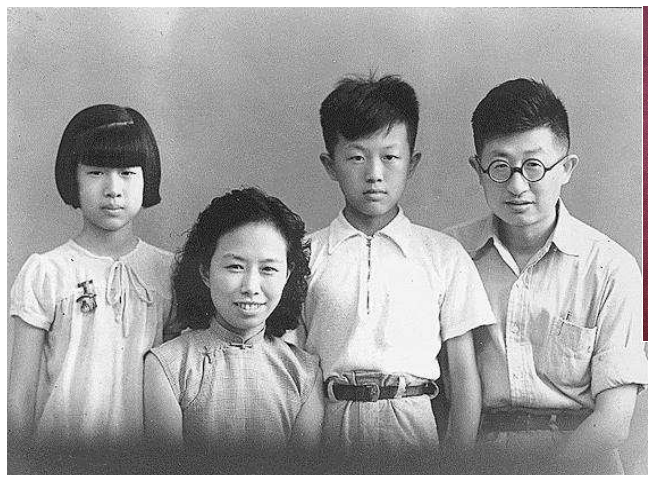
容易确定的是,一切是巴金的笔名,泰伦、微明是索非的笔名。署一切译的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,刊于《开明》一卷八号“儿童读物专号”;署微明译的《论嫉妒》,刊于《新女性》1929年第十二期;署泰伦译的有四篇:《幸福的梦》刊于《中学生》1930年第七期,《小红帽》《红帽女郎与狼》分别刊于《学生杂志》1930年第八期、第十二期,《小国王》在《文华》月刊1930年第十期开始连载,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,署索非译。

如此看来,“周姚”应与索非和巴金有关。但据“前记”由“我”写成,笔者推测“周姚”系索非的化名。

“周姚”即索非?条分缕析觅踪迹

索非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早期倡导者。1925年,他曾参与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改组,曾任世界语杂志《绿光》编辑和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,后任上海世界语学会干事,负责学会日常事务。巴金从法国回国后,索非介绍他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,也成为函授学校教员,并参与编辑《绿光》。

1926年,索非任职开明书店



周姚译《幸福的梦》与索非全家(摄于上世纪30年代末,索非之子鞠躬提供)

后,仍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兼职,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普及。他编写的《世界语入门》,多次再版,影响较广,是他在世界语著译方面的代表作;他还翻译并发表了不少世界语译作,如《幸福的梦》《小红帽》《红帽女郎与狼》和《小国王》等。

为证实“周姚”就是索非,需查核清楚其他译文初刊时的署名与索非的关系。解读“周姚”的含义,还要确认“周姚”与巴金无关。

下面先对其余七篇译文作一查考。

《小弟妹》是《世界语汉译小丛书》第一种,署鞠馨汉译;《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》刊于《开明》1929年2月号,署鞠馨译;《逃亡》刊于《新女性》1929年第十

期,署鞠馨女士转译,以上三篇(本)与鞠馨和鞠馨女士有关。

关于《世界语汉译小丛书》,1930年7月10日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第二十一卷第七号的《介绍世界语汉译小丛书》说:

绿的书店刊行《世界语汉译小丛书》(上海开明书店代售):选取文学佳著,并列世界语及汉文,伴读者对照阅读,于学习世界语甚为便利。其第一种为格林之《小弟妹》,鞠馨汉译;第二种为爱罗先珂之《为跌下而造的塔》,胡愈之汉译;第三种为裴有礼之《遗产》,索非汉译,以后更将陆续出版,特为介绍,以告求书者。

据目前掌握的资料,《世界语汉译小丛书》共出版六种,另三种为:泰伦译《小红帽》、胡愈之译《钟》和索非译《家》。“小丛书”均未署出版时间。胡愈之于1928年1月开始流亡,直到1931年初回国,所以,这套书是由索非操作的。索非之子鞠躬先生对笔者说“家里储藏室里堆了许多世界语和中文对照的小册子”,应该就是这套“小丛书”。

那么,鞠馨和鞠馨女士是谁?是索非妻子姚鞠馨?笔者曾向鞠躬先生请教。他明确回答:“可以肯定的是母亲不懂世界语,或任何外语,因为她出身于宁波的老传统家庭,精于刺绣。”那就非索非莫属了。但证据呢?

《新女性》1929年第7期刊有译自世界语的《家庭》一文,署保加利亚鲍莱诺夫著,鞠馨女士转译;《唐弢藏书·图书总录》收有

小丛书》第三种就是署索非汉译的《遗产》。因此,用在《新女性》杂志上的“无名”,可以确认是索非。

这样,可确认收入《幸福的梦》中的13篇世界语译文,一篇为巴金所译,11篇为索非所译。至于《四个音乐家》,未查到有关资料,可能未发表。实际上,《四个音乐家》与《小弟妹》《小红帽》等都是格林童话,笔者认为应是索非所译。

笃厚友情,难忘“非兄”与“馨嫂”

至此,似已找到“周姚”。但要确认“周姚”与巴金无关,尚需对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收在集中作出解释。为此,笔者一度未找到满意的说法,直到读到“周文”,才“豁然开悟”: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就是巴金“送”给索非的。他给毛一波“送”文的故事是最好的佐证。

1945年11月初,巴金独自从重庆回到上海看望病重的三哥李尧林。从《幸福的梦》付印时间1946年2月20日来看,那时该书开始酝酿、甚至已开始编选。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是巴金刚从法国回沪时翻译的,那时他住在索非介绍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会所;译文很快发表在索非主编的《开明》一卷八号,那时他俩同住在宝光里14号。这次在上海的一个多月,他又与索非一家同住霞飞坊59号,并知道索非将去台湾;而《幸福的梦》出版时,索非已在台湾。因此,就像15年前“送”文给毛一波,巴金把《茶房也是一个人》“送”给索非收入集中,是为了纪念他俩20年笃厚的友谊。

就这样,找到的“周姚”就是巴金的挚友索非。“周姚”也有其特殊“含义”:索非原姓“周”,他妻子姓“姚”,“周姚”就是两人姓氏合成的名字。实际上,这也是笔者最初猜测“周姚”是索非的理由。遗憾的是,索非夫妇最终分开了,巴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,但他忘不了与“非兄”、“馨嫂”在一起的日子,一直珍藏着两册《幸福的梦》,到晚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
而在台湾的索非,一直念念不忘留在大陆的发妻和一双儿女,70岁所作《家乘前言》中还留下一句“鞠馨何辜”?!故纸中的“周姚”以及鞠馨、鞠馨女士等名字,从而成了他俩曾经的美好时光最好的纪念。

《幸福的梦》收录了索非在世界语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的大部分译作,也记载了他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的贡献。后列入万叶书店的“万叶儿童文库”,于1950年10月30日再版。在台湾的索非,自然无法知道老友钱君匋再版了该书,而他亲撰的“编者献辞”及主编名都是必须删除的。